

人物

5

RENWU * 1983

一点不明之处，请予解答。

文章说夏洛蒂三十八岁结婚后，“终于压抑不住创作欲望的火苗，又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麦玛》……”

据我所知，长篇小说《麦玛》是与夏洛蒂同国的女作家简·奥斯汀所著，出版于1815年，当时夏洛蒂尚未来到人世。《姐妹三作家》一文讲到《麦玛》，是张冠李戴了，还是夏洛蒂也确实写过一部未完成的《麦玛》？请指教。

广西读者 于承杰

关于夏洛蒂·勃朗特的最后一部未完成作品《麦玛》，情况是这样的：

夏洛蒂于1853年末开始写《麦玛》，只开了一个头，因结婚停笔。婚后，她又准备写下去，但不久就病故。1860年她的丈夫应出版人请求，将残篇在《康希尔杂志》4月号发表，并由萨克雷写序（兼悼文），题为《最后一幅素描》。这部小说名《麦玛》，和简·奥斯汀的小说同名，但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1980年美国出版了署名“夏·勃朗特和另一位女士”合著的《麦玛》。这位“另一女士”，象高鹗续曹雪芹《红楼梦》一样，仿夏洛蒂的风格笔调续完了《麦玛》的故事，但实际上这本小说与夏洛蒂已无多大关系。

杨静远

更正

▲1983年第二期第186页“1954年，马老和中国新选出的理事、八大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其中“八大中央委员”及往下第八行的“党中央委员”有误，应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3年第三期第184页最后一段第一行“12月26日”，应为12月27日。

《人物》编辑部编辑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电话：55.0415）

国内代号 2-203 国外代号 BM423

1983年9月8日出版

定价 0.48 元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 2820 信箱）

人物 双月刊

从实际出发的范例

——记粟裕同志的一件事

肖 索 3

钱钟书 杨绛印象

邓国治 34

邹荻帆写诗轶事

高进贤 88

我与杂文

唐 弢 47

杂谈 愿有英俊出于中国

文 葆 117

从纪年法看康有为

王华农 168

随笔 借许由一议

冯建民 80

多亏贺老总插了一棍子

王春才 21

“受审”记

李聚奎 17

我的生活道路(上)

史 良 23

“和平将军”张治中(续)

余湛邦 92

冯玉祥题写“寅初亭”

李新邦 82

殷宗纆难讨“袁凶”——记先父杨庚笙

杨仲子 155

文武兼备，党之英才——《陈赓日记》读后

阮家新 133

开 徐寿——中国近代化学的开路先锋(鲁清元)

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三英雄(王颂云)

吴宪——首创蛋白质变性学说(刘堂江)

熊庆来——我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刘堂江)

我国影片中最早的女演员——严珊珊(尹史)

我国会计界先驱——谢霖(恽国钧)

106

奔向光明纪实

孙越崎 6

越过崎岖路，走向康庄道

——记著名矿业专家孙越崎

吴 京 13

{怀念集} 我的父亲王维克

王福洪 84

记天津市副市长姚峻

周文斌 127

“记骨室”主杨钟健

文 洋 67

我的北大学生生活

杨钟健 77

1983年 第5期

总第21期 9月出版

从“毛三爷”到“忽必烈”——记英若诚	王宏韬 任宝贤	37
“电影皇帝”金焰年轻的时候	碧 茵	44
谢稚柳话张大千	张友济	119
徐悲鸿与张大千	包立民	121
我是从高粱地里蹿出来的	韩 羽	63
双管齐下绘丹青	卢志峰 李如意	176
张乐平·三毛·漫画肖像	任 愚	89
我的老师侯加昌	韩 健	150
{ 借鉴篇 } 一个会计学家的自述	潘序伦	111
回顾我在中国的半个多世纪	爱泼斯坦	138
{ 古人轶事 } 谏而得官 如此私访 县令治蝗 { 拾 零 } 盗书牟利 君臣对话		159
刘向——中国古代著名“编辑”	仲 民	165
清末爱国知识分子容闳	官百星	100
{ 滴水集 } 邵力子挽孙中山(20) “没有皇家大道”(87) 一封率直的回信(110) 苦乐谤誉(187)		
漫画家笔下的张乐平(画页)	叶浅予等	90
杰克·伦敦的悲剧性结局	蜀 生	180
土耳其之父——凯末尔	朱克柔	169
史沫特莱青年时期的一件事	孙 觉	178
巴尔扎克登上文坛之前	徐 冲	174
{ 人物评价 } 李维汉谈瞿秋白 雍正的历史地位应该肯定 { 争鸣动态 } 替潘美翻案		183
不肯做人，偏要做狗——郝鹏举其人	顾龙生	184
读者·作者·编者		183
聚精会神(《漫画张大千》组画之一)	叶浅予(封四)	

人物 双月刊

从实际出发的范例

——记粟裕同志的一件事

肖 索 3

钱钟书 杨绛印象

邓国治 34

邹荻帆写诗轶事

高进贤 88

我与杂文

唐 弢 47

杂谈 愿有英俊出于中国

文 葆 117

随笔 从纪年法看康有为

王华农 168

借许由一议

冯建民 80

多亏贺老总插了一棍子

王春才 21

“受审”记

李聚奎 17

我的生活道路(上)

史 良 23

“和平将军”张治中(续)

余湛邦 92

冯玉祥题写“寅初亭”

李新邦 82

殷宗纆难讨“袁凶”——记先父杨庚笙

杨仲子 155

文武兼备，党之英才——《陈赓日记》读后

阮家新 133

开拓者 徐寿——中国近代化学的开路先锋(鲁清元)

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三英雄(王颂云)

吴宪——首创蛋白质变性学说(刘堂江)

熊庆来——我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刘堂江)

我国影片中最早的女演员——严珊珊(尹史)

我国会计界先驱——谢霖(恽国钧)

106

奔向光明纪实

孙越崎 6

越过崎岖路，走向康庄道

——记著名矿业专家孙越崎

吴 京 13

《怀念集》我的父亲王维克

王福滋 84

记天津市副市长姚峻

周文斌 127

“记骨室”主杨钟健

文 洋 67

我的北大学生生活

杨钟健 77

从“毛三爷”到“忽必烈”——记英若诚	王宏韬 任宝贤	37
“电影皇帝”金焰年轻的时候	碧 茵	44
谢稚柳话张大千	张友济	119
徐悲鸿与张大千	包立民	121
我是从高粱地里蹿出来的	韩 羽	63
双管齐下绘丹青	卢志峰 李如意	176
张乐平·三毛·漫画肖像	任 愚	89
我的老师侯加昌	韩 健	150
{ 借鉴篇 } 一个会计学家的自述	潘序伦	111
回顾我在中国的半个多世纪	爱泼斯坦	138
{ 古人轶事 } 谏而得官 如此私访 县令治蝗 { 拾 零 } 盗书牟利 君臣对话		159
刘向——中国古代著名“编辑”	仲 民	165
清末爱国知识分子容闳	官百星	100
{ 滴水集 } 邵力子挽孙中山(20) “没有皇家大道”(87) 一封率直的回信(110) 苦乐谤誉(187)		
漫画家笔下的张乐平(画页)	叶浅予等	90
杰克·伦敦的悲剧性结局	蜀 生	180
土耳其之父——凯末尔	朱克柔	169
史沫特莱青年时期的一件事	孙 觉	178
巴尔扎克登上文坛之前	徐 冲	174
{ 人物评价 } 李维汉谈瞿秋白 雍正的历史地位应该肯定 { 争鸣动态 } 替潘美翻案		183
不肯做人，偏要做狗——郝鹏举其人	顾龙生	184
读者·作者·编者		183
聚精会神《〈漫画张大千〉组画之一》	叶浅予(封四)	

从实际出发为例

——记粟裕同志的一件事

肖 索



1948年豫东战役中粟裕同志在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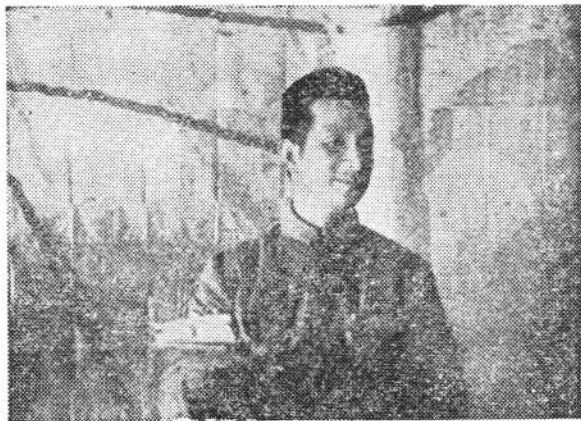
粟裕同志是驰名中外的军事家，在人民革命战争中战功卓著。尤其在三年解放战争的广阔舞台上，他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场面。这里记述的只是其中一件事。

1948年1月27日，粟裕同志接到中央军委发给他的一封重要电报，大意是：

为了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师回防江南，要他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三个纵队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并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

中央在电报中还要他“熟筹见复”。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我军已开始战略进攻。国民党蒋介石为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采取的战略部署是：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粟裕



同志看了这个指示，立刻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战略进攻。他认为，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积极组织部队进行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进一步考虑如何贯彻和更好地实现中央的意图。

问题的关键是，分兵渡江作战好，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好。经过一个多月的深思熟虑，最后他形成了一个看法：要想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它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我军势必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仗，尽可能多地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而当前，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他的依据是：

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重，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减少了。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

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性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他认为，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自然会给敌人以相当的威胁和牵制。但是，也有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如：我军远离解放区，无后方依托，实施连续作战，将遇到极大困难；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固然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主力军可能不会被调动，那样就达不到预期的行动目的。另外，我们三个纵队去江南作战，思想转弯也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这些不利因素，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总之，两相权衡，他认为我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但是这种与中央军委不相一致的想法，要不要向上提出呢？开始，他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在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上向中央军委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因而有些犹豫。后来他想到，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执行上级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考虑利弊得失，即使是从局部看到的问题，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也可能有参考价值。于是，他在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以及有关的建议报告了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对粟裕同志的报告极为重视。当时陈毅同志正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来濮阳，准备对部队进行渡江南进的动员。



奔向光明纪实

孙越崎

一个人一生中，往往有一个或两个转折点。这种转折点，决定着他今后生活的方向和道路。我今年九十岁了，回顾往事，觉得对祖国和人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甚至还有不少错误，常感自疚。但有一件事聊堪自慰，就是在四十年代末期光明与黑暗交替之际，我毅然作出了奔向光明的抉择。现在应《人物》杂志之约，就此作一简要的叙述。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简称资委会），是一个管理全国“国营”重工业企业的政府部门，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一个经济机构。解放时，资委会所属各厂矿的职员三万余人，其中留学或大学毕业的各项技术管理人员约占百分之六十，此外还有各种技工和工人约六、七十万人。我任资委会委员长时，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后决战。摆在我面前最严峻的一个大问题，是资委会向何处去？我个人向何处去？

中央军委接到粟裕同志电报后，立即要陈毅同志和他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听取了粟裕同志的详细汇报，并经过认真的研究后，决定改变原来的部署，三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

何 去 何 从

1947年7月，资委会辽宁省北票煤矿第一次解放，工程师俞再麟被打死。该矿总经理（我的大学同学）雷宝华告诉我：煤矿被游击队围攻时，俞再麟受员工推举出厂，向游击队求和，被一个营长击毙。得知俞的死状，我极为悲痛，便在《中央日报》发了一篇《悼俞再麟》的文章，诬蔑了共产党。不久，我去东北视察，才弄清楚俞再麟其实是矿厂被围攻的夜间离家躲避，在路上中流弹而死的。真相大白，我十分懊悔，便撤了雷宝华的总经理职务，另派人接替。

东北之行，所见所闻，使我相信：国民党的败亡，共产党的胜利，基本已成定局，思想上惶惶不安。留下吧，已得罪了共产党；走吧，既不愿亡命海外去当“白华”，又不愿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何去何从，内心十分苦恼。当时国民党借俞再麟之死大作文章。1947年8月间，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会长陈立夫从南京通电上海、北平、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等八大城市工程师学会的分会，要他们同一天为俞再麟开追悼会，以扩大反共宣传。当时我正在沈阳，沈阳的工程师多数属于资委会，我又是俞再麟的老朋友和上级，如开追悼会我是不能不上台讲话的，讲话就得骂共产党，而且沈阳各报一定要大登特登，广为宣传。但在这时，我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实在不想骂共产党了。于是我想了个办法：把追悼会改为公祭，在规定时间内来吊唁的，不论团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粟裕同志根据实际情况，独立思考，并勇于向中央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央领导同志虚心听取和考虑下级的意见，并从实际出发，改变自己原有的决定。这表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体或个人，可以随到随祭随走，象现在向遗体告别的仪式似的。这样，我就避免了上台讲话。

从以上免去雷宝华的职务和改变俞再麟追悼会的形式，说明了我思想斗争中，“留”的念头已占上风了。

拿 定 主 意

1948年2月，鞍山解放。资委会所属鞍山钢铁公司的人员，有些陆续回到北平。我也到了北平，从他们口中得知，鞍山被解放军包围期内，公司的员工无人伤亡。该公司总经理邵逸周因公在沈阳，协理靳树梁、毛鹤年、杨树棠、王之玺、邵象华及轧钢厂长李松堂、炼焦厂长李恩业等高级技术人员被留下并受到优待，其它人员愿留者欢迎，愿走的发路条，沿途放行。我得知这个情况后，大为感动和欣慰，对共产党对工矿企业工作人员的政策已经很相信了。

这年4月间，鞍钢机械技术员柯润华从天津乘轮船来上海，路过胶东半岛时轮船触礁沉没。这个地区已是解放区，当地人民政府把船上人员抢救上岸，妥善安置在农民家里。当轮船公司派船来接时，又把他们安全送到船上，其中一个珠宝商人的全部珠宝都完璧归赵。柯润华到上海后，来南京看我，他把这段亲身经历十分生动地讲给我听，我听了为之出神，十分感动。这使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更增加了认识，从此我下定了投向共产党的决心。

1948年10月，我在资委会本部礼堂召集了所属厂矿负责人会议，会上我把积压已久的想法讲了出来，大意是：目前大局形势，大家都已看得明白，不必多说。以前东北战事吃紧时，我帮助大家逃进关来，现在华北平津形势又吃紧了，怎么办？可能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看逃到哪里去都是一样。鞍钢是个很好的例子，从现在起，大家不要再逃了，应坚守岗位，保护财产，

办理移交，我想将来共产党仍会用我们的……我还让他们回去以后，向附近厂矿负责人秘密转告。由于大家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思想有共鸣，会场气氛轻松活泼。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这次会议是我的思想转变开始见之于实际行动，迈上弃暗投明的第一步。同时经过这次思想交流，也为后来资委会全体同仁留在大陆弃暗投明奠定了基础。

拒 迁 台 湾

1948年12月下旬，蒋介石召见我，一见面他便问：“你们南京有几个工厂？”我说：“生产的有五个：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他说：“把这五厂迁到台湾去。”我深感意外，可又不能拒绝，只得推辞说：“现在外边有谣言，说江阴要封锁，轮船不好雇，运输有困难。”蒋又说：“可以把机器设备由铁路运至上海，转轮船运去台湾。”我又推辞说：“五厂经济困难，拆、运、建，需要很长时间，经费无着。”他说：“这不要紧，你做预算来，我交财政部照拨。越快越好！”

回到资委会，我心情颓丧，南京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工厂不迁是不行的。无可奈何，只好照办。预算送上去，很快财政部以“紧急命令”如数照拨。机器设备拆迁工作也随即进行，陆续运至长江的下关码头，轮船也已租来，准备装船。正在这个关键时刻，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离开南京前往奉化，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我得知这个消息，以为蒋一定流亡海外，立即通知各厂把码头上的设备全部搬回原厂，重新安装，不迁了。过了大约三个星期，忽然接到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电报，说奉蒋介石之命，催我速把南京五厂迁往台湾。我接电后，即召集各厂负责人开会，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良策。我想蒋介石事多，也许拖一拖可以混过去，决定：工厂不迁，电报不复。这个决定要冒极大风险，当时电照厂厂长沈良骅挺身而出，表示拒迁工厂

是大家的愿望，但风险太大，要求分担我的责任，并提出具体办法。其它总经理、厂长坚决支持。这时，我的心情激动万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不久，汤恩伯第二次来电催促，我十分着急，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忘记这件事，怎么办？踌躇再三，我把电报拿去见代总统李宗仁。我说：“你正在想派和谈代表去北平，又在南京拆工厂迁台湾，显得没有诚意，对和谈不利，这虽然是蒋介石的主意，但外人不明真相，你和我都有责任。”李宗仁听后说：“对，我支持你，不要拆了。”

蒋介石发给五厂迁台费，原预算包括拆卸、迁运和在台湾重建三项经费，后来只拆不运、不建，还有七十八亿台币在台湾。为了免被扣发，急须将这笔巨款及时调回大陆。为此，资委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出主意，与台糖公司进行对划：即由台糖公司将在沪售糖的金元券拨与五厂，当日向台湾银行提出台币交与台糖公司。不出半月，全部兑完。这样，各厂又得了一大笔费用。蒋介石“偷鸡不着蚀把米”，恼羞成怒，1950年在台湾宣布开除我国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我。在我从香港北上返回大陆途中，蒋介石还派出军舰，企图拦截我所乘的船，结果错拦了别的船。

拒 迁 广 州

1949年2月，孙科把他的行政院迁往广州，同李宗仁的总统府唱对台戏。资委会虽然是行政院所属的部会之一，但我没有跟随孙科去广州。当时南京情况混乱，人心浮动。我便召集所属员工开会，要他们坚守岗位，保护资财。不久，吴兆洪率领一部分高级职员去上海办公，我仍留南京，与李宗仁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派自愿留在南京的电业管理处正副处长陈中熙、谢佩和兼任南京办事处正副处长，办理南京地区的业务。为解决资委会本部留南京人员及其眷属的生活问题，我又成立了一个“员工励进会”。

这样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将来可以完整地移交给共产党。我觉得这是我对员工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一个政治任务。不久，我又派煤业总局副局长吴京去长兴、杭州进行安排，以便迎接解放，办理移交。

1949年3月初，孙科辞职，行政院迁回南京，何应钦接任行政院长。撤销了农林部、水利部、资委会，成立经济部，派我为部长，仍兼资委会主任，不过这时资委会已是经济部下属的一个机构了。4月20日和谈破裂，何应钦等通知我立即去广州。22日下午我坐飞机去上海，当夜南京解放。我以前曾和李宗仁及资委会同仁说过，和谈不成我一定辞职，所以到上海后，决定辞职隐居，迎接解放。后来资委会一些同僚极不赞成。他们认为，我辞职未必获准，一定会来电催我去广州；倘若辞职获准，别人接替，谁敢保证他不会下令拆工厂、运器材、派人员去台湾呢？这不是违反你的初衷吗？他们要求我不辞职，去广州，以掩护大家的安全，直到上海解放。我认为这意见很有道理，遂打消了辞职的想法。

我们在上海的物资，除价值千余万美元的器材已上运汉口等处外，尚有石油、白糖、钨及钢材等存在仓库里，准备解放时移交给共产党。后来汤恩伯下令彻查“资委会疏运物资不力”事件，留沪人员大为恐慌。我们设法找到上海地下党的季崇威同志，与他共商对策。地下党表示：共产党不强人之所难。今后以保全人员为主，物资为次，能留则留，不能留可以运走一些。实际上，后来物资并没有被运走，但党的这种通情达理的态度，使我很满意。

资委会副委员长吴兆洪曾于1948年12月把眷属送去台湾，对此我十分着急，因为这会影响人心。我便多次同吴推心置腹地交谈，劝他下决心留在大陆。我说：“我是委员长，你是副委员长，论罪恶我比你大。算旧账，我被枪毙，你至多坐班房。我被枪毙都不怕，你怕什么呢？”他终于决定不走了，1949年3月间把家眷从台湾接回了上海。4月底我去广州时，便把上海方面的事

情交付与他。他到机场送我时说：“上海解放前，你不能辞职去香港。我们怕特务为难。你不辞职，可以掩护我们。”我说：“一定照办，请放心。”

我到广州后，找到何应钦，请他解决资委会人员去广州的住房问题，何表示为难。我便乘机说：“既然如此，他们是不是可以不来？”何表示可以。据此，我立即发电给吴兆洪等，转达了何应钦的话。这样，资委会在沪人员有了一张护身符，来应付汤恩伯和一些特务，放心地留下了。我为他们做了很好的掩护，心里很高兴。

弃暗投明

我在广州前后约半个月。5月中旬行政院开例会，我因事派次长出席。会上陈诚以台湾省主席身份列席，说了些怀疑我的话。我得知后，立刻逃离广州，到了香港。

1949年6月，我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后，除与中共在香港的有关同志联系外，还把有关情况函告已在北平的邵力子。邵很快回信，说周恩来同志欢迎我随时去北平，我很高兴。但这时香港资委会国外贸易所还存有钨、锑、锡等外销矿产品，约值美金五六百万元。我决定使这批物资转到人民手里以后，再去北平。

我离开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任职务后，接替者是刘航琛。他派亲信方崇森做国外贸易所的所长，以便控制这批物资。我便对所里几个高级人员进行工作，鼓励他们拒绝刘航琛、方崇森的领导，保护仓库里的物资。我又组织吴志翔等人参加贸易所的斗争，介绍他们与中共在香港的同志联系，并成立了护矿产品委员会。经过一些曲折复杂的过程，1949年11月14日，以吴志翔为首的资委会国外贸易所全体员工通电宣告起义，毛主席曾复电嘉勉。

在这一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就绪以后，中共香港有关同志同意我北上，我便偕妻子和小儿子一起经青岛、天津，到达北京。从此，我的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

越追越崎路，走向康庄道

——记著名矿业专家孙越崎

吴京

局大变动中，有两件事是做对了的，一是在抗战初期把焦作中福煤矿的机器设备拆迁四川，为抗战出力；一是在解放战争后期鼓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全体人员保护工矿财产，留在大陆，交给人民。”

孙老的这些话，是肺腑之言，也是实事求是的。

(一)

孙老是浙江绍兴县同康村人，

孙越崎先生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经济部长，但他主要是一个矿业专家。他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前夜，决心投向光明，为国民党政府所属工矿企业和有关人员留在大陆，做出了努力。解放后，他曾担任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任煤炭工业部顾问，民革中央副主席。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我认识孙老已经快五十年了。1935年，我在焦作工学院读书，孙老当时兼着学院的董事长，有一天他来校讲话，中心内容是宣传实业救国。其中有一句话：“钢铁是机械之母，煤为动力之源”，给我印象很深。我能坚持煤矿工作近五十年，孙老的这句话是有影响的。后来，我又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解放后接触和了解更多。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和其它人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生中做过不少错事，但在两次时

1893年生，父亲是个秀才。十七岁时，他到绍兴考入简易师范学校。后上海复旦公学。1916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科，想走实业救国的路。五四运动时，他以北洋大学学生会长的身份，奔走活动，被开除学籍，后得蔡元培先生帮助，转入北京大学采矿科，1921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他在吉林省的穆稜煤矿做了六年技术工作，备尝艰辛。但他通过这一实践，掌握了一个新开煤矿的全部生产建设过程。